

改革都有 红利吗？

一台国家机器的
顶层设计与技术操盘

何以改革红利造就了清王朝的长寿，
又成了晚清的夺命索？

[澳] 雪珥 / 著

以大量的海外史料和国际化的崭新视角，
检修清王朝这台庞大的国家机器，
探索改革和国运之间的关联。

既得利益集团为什么引爆了激进的“革命”？
如何打破“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的魔咒？
中国曾经跌倒在哪里，还可能会跌倒在哪里？
中国做对了什么？今天的改革，还需要做对什么？

一切改革的背后都是利益关系的调整，
都是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博弈。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改革都有 红利吗？

一台国家机器的
顶层设计与技术操盘

[澳] 雪珥/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改革都有红利吗? ——一台国家机器的顶层设计与技术操盘 / (澳) 雪珥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399-6678-6

I. ①改… II. ①雪…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清代
IV. ①K249.07

·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5974号

书 名 改革都有红利吗?

著 者 [澳] 雪 珥

责任编辑 孙金荣

策划编辑 一 航 张 磊

特约编辑 单涛至

责任校对 郭慧红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内文设计 李慧娟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1

字 数 222千字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678-6

定 价 38.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Preface 自序

改革红利与国运嬗变

1

改革红利与国运的关系，其实一直都是串联起中国历史的潜在主线索。

无论是《吕氏春秋》中的百般譬喻：“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殍子矣。”（《察今》）还是王安石的慷慨悲歌：“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宋史·王安石传》）都说明在“时不与法俱在”的情况下，应该与时俱进——“世易时移，变法宜矣”。

千古犹行秦王政。通过对中国历史上自秦代以来 12 个统一王朝的粗陋切片分析，至少在统计意义上，显示着改革红利与国运存在着某种正相关关系。

2012 年的秋天，我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统计分析，对比 12 个统一王朝的开国第 63 年。在开国第 63 年，3 个王朝已经夭折（秦、西晋、隋），3 个王朝则一地鸡毛（东晋、南宋、元），余下的 6 个王朝（西汉、东汉、唐、北宋、明、清），都表现出了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各种艰难中的坚定变革。这种变革，有的出自最高领导人本身（西汉、明、清），有的出自摄政的皇太后（东汉、北宋），有的出自擅权的皇后（唐），但无论是谁主导了变革，这些王朝都因获得了改革的红利而延年益寿。

2

在这 12 个王朝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清代，原因有二：

一、这个王朝离我们当下的距离最为接近，其在晚期开始所经历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 1872 年语），至今仍未终结，历史学家唐德刚形象地称之为“历史三峡”。同在这个“三峡”中，我们当下所经历的冲击、应对、变革，或许可以从晚清的类似经历中，发掘出更多的可资镜鉴之处。

二、这个在 1644 年以异文化、异种族入主中原的朝代，居然成功地战胜了“自古胡人无百年之国运”的历史宿命，克服了元朝所经历的强烈排异现象，政权延续了足足 267 年（自入关的 1644 年算起，至 1911 年），从而在自秦以来的 12 个统一王朝中，占据了最长寿王朝的季军宝座，仅仅次于唐朝（289 年）和明朝（276 年）。考虑到晚清时还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冲击，这个无论先天条件还是外部环境似乎都不占优势的政权，居然能够如此长寿，原因何在？

3

摆脱成王败寇和阶级斗争这两个惯性思维，放弃将失败的前朝脸谱式地妖魔化为笨蛋（所谓“愚昧颡顽”）与坏蛋（所谓“反动腐朽”）的宣传式历史判断，我们就能发现，造就清政权长寿的基因，正是其入关之后不断与时俱进的改革、不断积累的改革红利。

这些改革红利，在巩固执政合法性、扩大执政基础、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成为清政权的巨大“正资产”，甚至在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深重的内忧（太平天国战争）外患（第二次鸦片战争）下，大多数西方媒体和外交官已经悲观地计划如何面对“中国崩溃”后的残局和乱局时，这个政权却出人意料地缔造了“同光中兴”的数十年辉煌，并延续了足足半个多世纪的寿命。

同样，也是因为改革红利释放的进退失据，令晚清的最后一轮改革超速失控，既得利益集团既直接绑架了改革，也间接绑架了革命，改革红利反而成为“负资产”，甚至“黑利”，最后颠覆了改革、颠覆了政权，也颠覆了社会。

贯穿清代历史的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五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是始于顺治朝、完成于康熙朝的一系列触及根本的政治变革，即通过科举扩大执政基础、通过祭孔宣示普世价值、通过祭朱承接中原道统。

这场改革，对于清政权来说，是一次深刻的定位转型，是从“造反者”转型为“执政者”的关键改革；也是大清凭借枪杆子里出政权之外，能够迅速夺取并巩固全国胜利的三大法宝。

清代第二阶段的改革，主要发生于第三代领导核心雍正的治下。

开国百年后的这一轮改革，焦点不再如第一阶段那般涉及政权合法性的建设，而是集中在完善和改良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技术”层面上。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重大的举措：一是改革了接班人制度，将延续千年的嫡长子公开立储制度，改成了秘密建储制；二是建立了军机处，并在实际上取代了内阁，成为最高行政机构。同时，“摊丁入亩”和“耗羨归公”这两项改革，是典型的政改影响到经济和民生，推动了经济和民生的重大变革，影响极其深远。但是，这两项改革更像是应急式的维稳措施。通过在原则上的退让和技巧上的更新，起到了短时强心针的作用，却为今后埋下了巨大的隐患，掉入了“黄宗羲定律”的泥潭之中。

发生在雍正朝的第二阶段改革，面广点多，雍正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改革皇帝。他的这些改革措施，在随后的乾隆朝得到了巩固和深化，成为国家制度。乾隆时的中国，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和富国，依托的正是此前100多年来乃祖、乃父在政、经两方面改革红利的积累。

但是，乾隆朝本身的变革，乏善可陈，反倒进入了铺张浪费的拜金时代。到嘉庆、道光时期，因循守旧吃老本成为主流，改革几乎从中国官方舞台上彻底退场。从嘉庆彻底掌握中枢权力（1800年）开始，到鸦片战争爆发，仅仅相距40年，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仅仅50年，其间不仅毫无改革，而且贪腐横行，将前几次的改革红利迅速耗尽，最后迎来了内忧外患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国运也因此与世界发展方向呈现了完全相反的走势。

在改革停滞的同时，“制度腐败化”与“腐败制度化”却因为缺乏改革的冲刷和荡涤而越演越烈。最为典型的，是在国力最为辉煌的1770年，“腐败化的制度”催生了行贿基金这种“制度化的腐败”工具，如此制度“创新”，加速了整个体制乃至整个社会的腐败和沉沦，而在这整体腐败与沉沦中，原本可以发挥自我矫正功能的改革，却缺位了。

5

在太平天国的风暴中，清代开始了第三阶段的改革。

当狂飙席卷大半个中国之时，无论在军事还是财政上都已经捉襟见肘的帝国中央，剩下的唯一资源就是权力了。这个资源被迅速地投入使用，官员和缙绅受到鼓励，自行招募并训练军队——这在中国历史上，以中央政府的名义鼓励和支持地方练兵，是极为罕见的。以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批“军政两用人才”，迅速崛起。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央虽然下放军权，却坚持将财权抓在手上，通过饷银来调控和制衡曾国藩等坐拥雄兵的将领。其具体的体现，就是坚决不任命曾国藩等人兼任地方行政职务，将“军”“政”严格分开。军队的粮饷供应，必须仰赖行政体系的支持。这一对枪杆子设防的政策，在局势复杂的战区，实际上难以执行，造成前线将领十分被动，曾国藩曾感慨说“无土无财，无位无民”，“武不能补千把外委之实，文不能辖府厅州县之官”，筹粮筹饷处处受到地方掣肘，甚至在一怒之下，干脆借奔丧为名，撂了挑子在老家静观局势。直到局势日益糜烂，中央不得不同意赋予其地方实权，他才出来工作。

咸丰皇帝死后，恭亲王和两宫太后发动“祺祥政变”，打倒了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令曾国藩大感意外的是，政变后18天，新的中央就发布上谕，命令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掌管浙江全省军务，还命令杭州将军瑞昌帮办。以一个汉人总督而节制四省，并且明确驻防将军只能做副手，这一放权力度之大，创下大清国历史记录。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s）认为，曾国藩被授予两江总督，“这是内战的一个转折点，就许多方面说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

点。正是满族君主政体与汉族上层分子中的领袖人物融为一体的这个强大的保守联盟，才使王朝得以苟延到20世纪，并对整个共和时期中国政治生活的机制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久，刘长佑、左宗棠、李鸿章等，也纷纷出任封疆大吏。

这一改革当然是被动的，但其红利比较丰厚。这是八旗入关推行“科举”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扩大执政基础”的实践，也标志着清政权执政集团身上的“全民党”色彩更为浓郁，标志着在“异端邪教”的挑战下，道统再度超越了种族，成为凝聚体制内精英的最重要黏合剂。湘军、淮军、楚勇等，与其说是“勤王”之师，不如说是“卫道”之师，这个政权的合法性，通过道统而得到了加强。

但是，这一被动改革的成本也极大，那就是中央权威的日益丧失。

在战争中下放的军权，战后却难以回收。虽然曾国藩兄弟主动解甲交权，但依然需要其他人如左宗棠、李鸿章等以同样的方式带兵——军队成为将领的子弟兵，而将领则成为中国近代军阀的发端。

对政局有着更大影响的，是战时财权的下放，在战后也难以回收。传统的“奏销”制度实际上名存实亡，更为致命的，为了确保财政收入，中央退而求其次，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规定了“京饷”定额，硬性摊派给地方。这种“改革”措施，看似强悍，实际上色厉内荏，等于变相承认：地方只要足额缴纳“京饷”，就可以自由支配其余的财政收入，而且，中央根本就不问“京饷”的饷源税种，只要真金白银。

可以说，在此前几轮改革给清帝国带来巨大红利之后，因征剿太平天国而推行了以全面放权为特色的改革，虽在短期内挽救了帝国，代价却是高昂的。帝国在50年后的毁灭，很大程度就是种因于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样的改革，或者说“被改革”，可以说是饮鸩止渴。

6

清代最后的50年，是实行近现代意义上“改革开放”的50年。以甲午战争为分界，分别构成了清史的第四、第五阶段改革。

第四阶段的改革，从1861年推行“洋务运动”，到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总共33年。这是一场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改革运动。这场改革的动力，完全来自形势的倒逼，在内忧外患的持续打击下，体制内的精英奋起变法，学习西方，重点在于经济建设，而尤以国防军工建设为重。这一轮改革，红利十分丰厚，缔造了“同光中兴”。大清国的综合国力，与改革之前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经初步建立了近代化工业的框架轮廓，日渐找回了自鸦片战争后久违的大国感觉。

甲午战争之后，清朝的改革进入了第五阶段，即开始于1901年的晚清新政，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清政权被推翻。这个阶段改革的最主要特点，就是推行以宪政为核心的政治改革，并且速度越来越快。

甲午战争之后，败于蕞尔小邦日本的耻辱，令朝野上下深受刺激。改革的中心迅速地转向政治体制，精英阶层试图寻找某种“主义”的捷径，这随即导致了政治上的巨大分裂。这种分裂，表面上看是意识形态之争，最初体现为“是否政改”之争，随后又体现为“如何政改”之争，骨子里却依然是极具中国传统的利益之争、权力之争、党派之争。极右而盲动的戊戌变法，极左而同样盲动的义和团运动，看似针锋相对，其实都是在甲午战败的巨大刺激下而导致的心理失常和行为失范。

在亢奋之中，帝国开始推行“新政”。将洋务运动与新政相比，区别是显著的：前者侧重经济基础，后者侧重上层建筑；前者主要是依靠现有体制进行改革，后者主要是对现有体制本身进行改革。这无疑是一种传承、提升、进步。

但是，问题在于，精英阶层似乎彻底否定了洋务运动的稳健作风，而在新政中试图进行“大跃进”。他们将绝大多数精力都投放到了对万能“主义”的寻找以及试错，更为基础和根本的经济建设被撂在了了一边。这直接导致了帝国大厦的头重脚轻，最后自行解体。

7

对于第四、第五两个阶段的改革，我此前已经发表了近百万字的文章，并将这两个阶段的改革概括总结为两句话：

不改革等死，

乱改革找死。

基于对“不改革等死”的恐惧，才有了洋务运动，并取得了“同光中兴”的阶段性成果；新政变革，却在“大跃进”心态的驱使下，走上了“乱改革找死”的不归路。

晚清新政的政改“大跃进”，在某种程度上透支了此前33年洋务运动积累的改革红利，这与嘉庆、道光两任皇帝在50年间透支前人的改革红利，略有区别：嘉道二帝的问题在于“不作为”，坐吃山空，其衰败是逐渐蔓延的；而晚清新政的激进无序政改，则是“乱作为”，自己折腾，其衰败是迅速，甚至有些突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洋务运动和晚清新政这半个世纪的改革运动中，尤其是晚清新政的10年内，清帝国几乎所有的改革成本，通过各种摊派，都落到了小民的肩上，改革的成果却被极少数既得利益者垄断。草根阶层不甘心，也无法继续为不公平的改革埋单，成为清末恶性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基本原因。

而既得利益集团，既不忠于政权，更不忠于人民，但是，他们凭借手中的政经资源，在面对人民的时候，以公权力的代理人或经纪人自居；在面对政权的时候，则又以民意代表自居，“挟官以凌商（民），挟商（民）以蒙官”。引爆辛亥革命的四川保路运动，本质上就是既得利益集团上下其手，所挑动的政府与民众的对立，放了一把野火之后遂成燎原。

8

从清代267年历史看，改革作为最大的红利，其对国运的要害在于：

一、红利的获取，其代价是什么？谁来承受成本？

二、红利的分配，其准则是什么？谁来享受收益？

这两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比增进红利总量更为关键。也正是根基于这两个问题，改革的关键，正在于要时时警醒于“改革本身的改革”——不断地深化改革，才能创造“红利中的红利”——避免“红利”变成“黑利”。

贯穿清代历史的改革，至少证明了一点：改革红利能惠及整个体制或者大多数人时，改革就成为政权的长寿基因；反之，如果改革红利只能惠及一小部分人群，并且将大多数人作为改革的垫脚石和沉没成本（sunk cost），则改革就必然成为夺命基因。一旦红利异化为“黑利”，社会将被撕裂，政权的大限也就不远了。

9

改革的效果究竟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这主要是一个“技术”问题。

纵观整个清史中的各项改革，真正起作用的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非意识形态层面的“主义”。撇开眼花缭乱的那些作为幌子的大话套话，一切改革的背后都是利益关系的调整，都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一切改革也是对“国家机器”的技术调整而已。

当代的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已经承认了企业管理、经济管理是一门科学、一门技术，但是，我们还没有承认国家管理、政府运营也是一门科学、一门技术，并非一切都与意识形态层面的“主义”相关。诚如我在本书后记中所说，“泛意识形态化”与“既得利益集团”、“‘大跃进’心态”一起，成为阻碍中国前进步伐的三块绊脚石，而“泛意识形态化”正是这些绊脚石的根本所在。走出“泛意识形态化”，还原到“技术”层面，才能从前人的改革史中，真正地汲取经验教训，资治通鉴。

试图从国家机器修整的技术层面，通过一些节点的叙述与分析，来寻找清王朝长寿及崩溃背后的技术逻辑，正是这本书的目的所在。



目 录

Contents



自 序

改革红利与国运嬗变 / 001



引 子

开国 63 年：大历史的切片 / 001

国祚几何？ / 003

夭折的帝国们 / 006

无奈的汉武帝 / 008

驱走饿狼，又来猛虎 / 009

寡头政治下的均衡 / 011

武则天的新时代 / 012

被误解的掌舵人 / 013

谁逼疯了宋光宗？ / 015

迟到的“鲁班天子” / 016

“促织天子”的铁手腕 / 017



第一章

三大法宝：马背政权的温情转身 / 021

被“绑架”的读书人 / 023

谁同化了谁？ / 024

第二章

最后的皇家“身份证” / 027

百年宿命大逆转 / 029

第三章

接班人：暗箱里的皇冠 / 033

西暖阁讲话 / 035

皇家的父子关系 / 038

康熙的两次训话 / 042

第四章

军机处：清代“国安委”的制度创新 / 047

从“军委”到“政委” / 049

皇上的编外“智库” / 051

相权的终结 / 054

皇权的“和平演变” / 056

扁平高效的“小政府” / 059

第五章

民心工程：被逼无奈的自我疗伤 / 067

仁政下的寻租空间 / 068

动了谁的奶酪？ / 071

难以承受的潜规则 / 077

灰色收入的集体漂白 / 080

“黄宗羲定律”的陷阱 / 083

弹性反腐：一位财务“副省长”的死刑 / 087

不怕“鞋湿”的布政使 / 088

40两银子的死刑线 / 089

雍正的“网开一面” / 091

乾隆震怒 / 093

最终还是被“潜”了 / 100

第六章

行贿基金：贪腐走向资本化 / 103

皇上的小金库 / 104

皇恩浩荡下的“利益均沾” / 107

无处可逃的行商们 / 109

“公所基金”的秘密 / 112

鸦片贸易进入“伶仃洋时代” / 116

第七章

圣谕宣讲：大清的“精神文明建设” / 121

张树声的直隶新政 / 123

朱元璋的“大棒”与“胡萝卜” / 125

将“全民教育”进行到底 / 127

“宣讲”好饭碗 / 130

第八章

第四代难题：乾隆遭遇大革命 / 135

与英帝国的第一次对视 / 137

法国大革命的阴云 / 138

从北京到凡尔赛 / 140

英国使团的中国印象 / 143

一位法国老传教士的来信 / 146

第九章

资本盲流：上海地产首次大崩盘 / 149

上海滩第一代地王：徐润 / 150

房地产市场的“法制化” / 153

第十章

维稳的红利 / 155

即将破灭的地产泡沫 / 157

被搁浅的地产大鳄 / 161

帝国出轨：铁路总公司之路 / 165

国字号惨败 / 167

钱从哪里来？ / 168

一份“互惠互利”的奏折 / 171

“利权回收”的真相 / 174

第十一章

戊戌变法：衰老帝国的激情一跳 / 179

变法诏令满天飞 / 181

无谓树敌要不得 / 184

虚弱的改革班子 / 187

一个谣传引发的政变 / 188

第十二章

张之洞：走向军机的惆怅 / 193

广东“赌王”的生意经 / 195

谁是“连仲三”？ / 198

军机处大门外的张望 / 200

后院起火 / 204

第十三章

刚毅整顿：失控的大清财政 / 209

财权下放恶果 / 211

地方政府成为“车匪路霸” / 214

“永不加赋”过期作废 / 217

第十四章

贪官污吏抢搭便车 / 219

刚毅挥棒下江南 / 220

错失最后一根稻草 / 223

庚子年危机：炉火上的群雄博弈 / 227

一份假情报惹来的滔天大祸 / 229

红顶赌王：刘学询 / 231

“总统”李鸿章 / 233

张之洞的帝王梦 / 235

孙中山的“另一面” / 237

第十五章

货币之乱：铸币机上的宪政 / 239

突然失宠的银子 / 240

孔方兄的逆袭 / 242

疯狂的铜元 / 244

美国方案与中国难题 / 246

第十六章

丁未政潮：无处不在的权争 / 249

扑朔迷离的“性贿”案 / 250

躺着中枪的段芝贵 / 254

桃色反腐案的背后 / 256

被引爆的“反腐炸弹” / 258

第一回合：两败俱伤 / 261

北洋派的致命一击 / 265

第十七章

民变之变：谁来做最后的埋单人？ / 269

清式特色的“民变” / 271

零和游戏 / 274

风起云涌的抗捐事件 / 277

集体失控的代价 / 281

第十八章

流亡生意：康有为的党产 / 283

保皇党下海 / 285

师徒反目的背后 / 287

海外华商的“背叛” / 289

第十九章

投机风暴：机会主义大革命 / 293

失信天下的清政府 / 295

靠口号牟利的保皇党 / 297

革命机会主义 / 298

尾声

激进的悬崖：通往死亡的快车道 / 303

吴樾的那颗炸弹 / 304

迟来的改革共识 / 306

激进主义的狂飙突进 / 308

一起跌落激进的悬崖 / 310

后记

中国曾经跌倒在哪里？ / 312